与思想者對話錄

·钟敬文·



灏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生于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广东海丰人。二十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一九三四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研修神话学和民俗学。解放前曾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香港达德学院等多所大学任教。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至今。主要学术著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民俗学论集》、《话说民间文化》等多种，并有文艺评论集《兰窗诗论集》、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等著作。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去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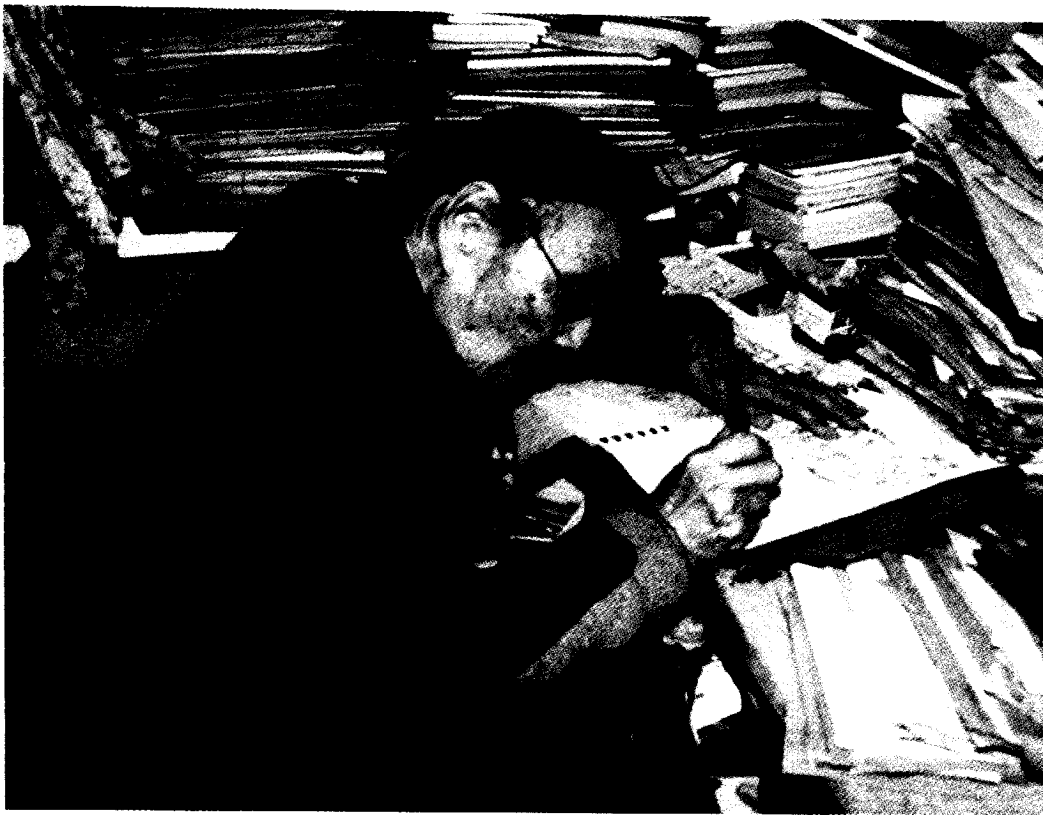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到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热门课题，人们注意到大多数论者都是在儒、释、道等上层文化中找答案，只有您偶尔提醒一下要注重对中、下层文化的研究。为什么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兴起这么些年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仍然如此轻视它呢？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呢？

钟敬文：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有两千多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圣贤文化（或者叫精英文化、少数人的文化）。那时虽然也有采风问俗的传统，但那是为贵族政治服务的，老百姓的民俗文化，还得不到真正的重视。这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传统的上层文化建设得比较完整，影响也比较大，像我国以往的诗词文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等，讲的大都是上层文化；而民俗文化一直是被认为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解放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主体是工农，这对重视民俗文化的工作是有利的，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俗学研究得还不够，有一个时期，民间文艺学（包括在民俗学之内）甚至被打入了冷宫。近二十年来，形势好多了。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救了民俗学，也救了人类学、社会学等一些相邻学科。解放后在大学里是不能讲民俗学

的，现在都成了必修课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比起上层文化研究，它的历史还很短。

另外，从民俗学本身的学术史来讲，从一九一八年北大的歌谣学运动算起，它虽然已有八十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学术上，还比较嫩。很多时候，比起上层文化，它的建设还得不到应有的扶植，所以，它的名声还没有上层文化那么大。但是，它和上层文化共同组成民族的整体文化，是民族整体文化的基础部分，不容忽视，这也是它这些年能“热”起来的根本因素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有它自己的生命力的。至于像你谈到的，有些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轻视民俗文化，这种看法对不对，我想，他们的认识至少是不大全面的吧。治中国学问，没有对民族民俗这一层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容易搞好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建设的。在老百姓的文化研究方面，精英不能包办，这是肯定的。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遗留物”，往往是和生产力不太发达、精神生活不够丰富的社会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有人提出现代文明前进的过程也就是民俗衰落、失传的过程，先生同意这种说法吗？



◎钟敬文先生　　（罗雪村摄）

钟敬文：“遗留物”的说法，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早提出来的，原意是要通过对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习俗在工业社会得到保存的现象的研究，证明现实工业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三点：第一，是民俗文化比起上层文化确实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有的民俗事象甚至可以传承几千年而很少变化，像“三礼”中记载的一些精神信仰的东西。再比方说，乡人傩，孔子的《论语》上就说他站在庭院的台阶上看这种仪式，到今天我国南方一些村落还在表演。但这毕竟是少数。第二，是大多数传统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按照“自正”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民众不是笨伯，他们是创造和享用民俗文化的主人，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像我经常讲的放风筝、划龙船这些习俗，过去都是驱疫避邪的巫术，现在呢，大都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了。在荆楚一带，划龙船还被说成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仪式，连老百姓的意愿也变得十分美好了，这比起古老的旧俗，就不能说是原封不动的“遗留物”了。第三，还有少数民俗，不是“遗留”或变革了，而是被淘汰了，消失了，像缠足之类的陋俗。

从总体上说，民俗是一种传承文化，它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异性。现在是社会转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期，有人担心，很多民俗都变化了，有的还濒临消失了，民俗学还有用吗？从我刚才讲过的道理看，担心民俗文化前景的忧虑是不必要的。优秀的民族民俗传统文化，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仅从亚太国家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看，民族民俗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都是并行不悖的。

有不少人写文章说，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却越来越找不到过节的感觉。比如过年，小时候盼着过年，不仅因为过年可以好吃好喝，更因为过年时有一种宗教式的氛围令人神往。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过情人节或圣诞节。先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钟敬文：现在电视、电脑成了日常生活用品，中西文化传播得都很快，连过年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受到了西方节日的冲击，有人还提出了文化全球化的说法。但我看，文化全球化的本质，是要以少数技术发达的国家的文化去统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这不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搞现代化，但目的是要壮大自己，而不是使自己被“化”掉。要注意吸收别人的优秀的东西，也要继承发扬自己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

这里就有一个导向的问题，不能放任自

流。你让它自流，那就有两种：一些年轻人追求西化，过情人节、圣诞节；一些老年人，热衷于建祖坟、修庙宇，这一左一右，主要就是缺乏导向。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鱼生活在水里。民俗几千年来，就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春节民俗，它就有一股凝聚力，能把人们组织在一起，黏合在一起。像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说外国话，穿西装，但他们过节的时候，仍然要吃年糕，放鞭炮，耍龙灯，穿旗袍，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节日习俗表象的背后，有一座精神文化的桥梁，这座桥，便是既稳固又现实的民族民俗文化，外国人只有通过这座桥，才能走进华人华侨的生活世界。

民俗学作为交叉性的人文科学，需要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您认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为合理？

钟敬文：搞哪一门学问，都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要有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民俗学有其特殊性，要懂民俗理论、民俗史、民俗事象，还要有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训练。现在有些年轻人想省事，只看一点流行的理论、学说，没有第一手材料那就不容易得到学问上的正

果。比如，北京有一个大钟寺传说，说一位古代工匠铸钟时，怎么铸也铸不好，他的女儿跳进铜水中，就铸成了。这种传说在古代很多。因为当时人们对造桥、铸钟等大的工程没有把握，就需要借助一种神秘力量；“人牲”仪式就是把人最宝贵的生命作为献给神的祭品。有的人用刘胡兰式的英勇牺牲去解释，就不对，因为缺乏宗教学的知识。演戏要科班出身，搞民俗学，也要有系统的知识，不能用常识或一般文学的知识来代替。

您说自己没有如顾颉刚先生期许的那样，写出一部精深的民俗学著作，您后悔吗？

钟敬文：我欣赏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成功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伟大。”虽然我没能写出一部传世的书，但我高兴地看到，我国的民俗学事业发展了，这才是最要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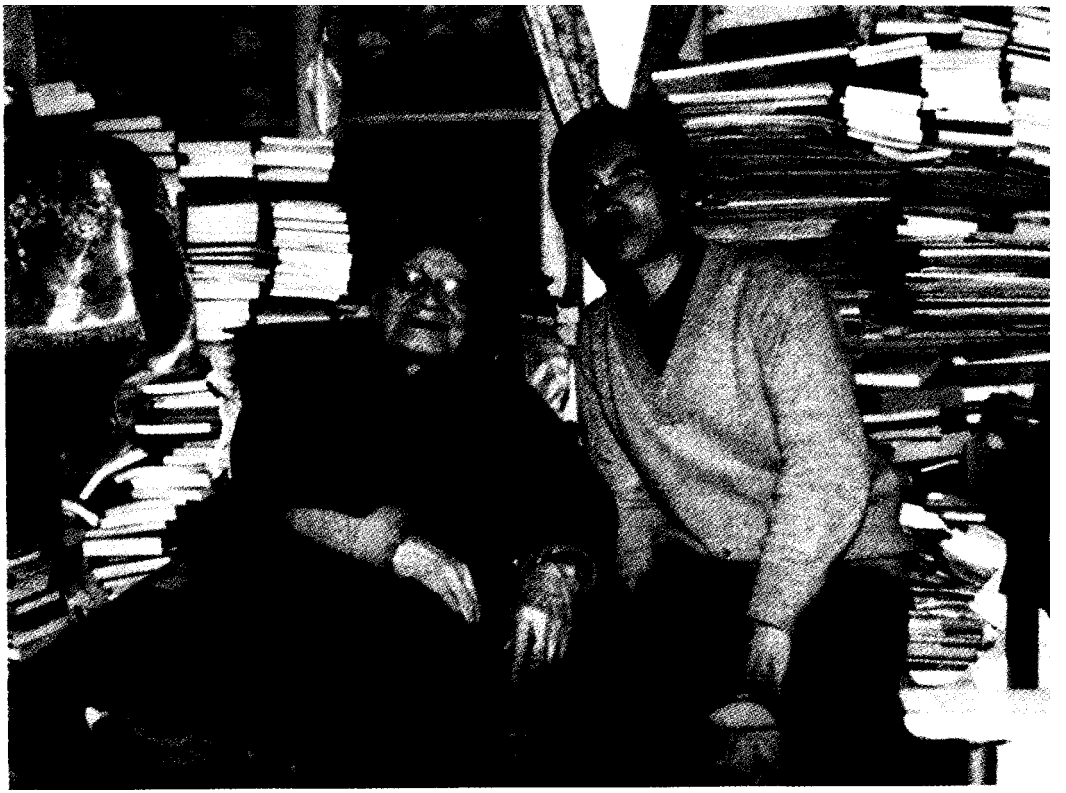
与西方最先进的科研成果相比较，中国当代民俗学还存在哪些差距，怎样弥补？

钟敬文：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输入的西学的推动；在学科建设的早期，我们也经历了向外国理论描红格子的阶段。但是平心而论，即使在描红格子的时期，中国民俗学依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民俗资料、文献的丰富性是不可比拟的。

就连美籍民俗学者 R.D.詹姆森都说：“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现在我们已经“成人”了，和外国民俗学的关系更不应是主仆或君臣的关系。胡乔木同志曾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破烂，也不要无产阶级的破烂。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俗学学派，应该对世界民俗文化有较大的贡献。

本文题图：罗雪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与钟敬文先生合影　　（罗雪村摄）

1999 年 1 月 29 日,我和徐怀谦一同到北师大看望钟敬文先生。告别钟老后,小徐说：“将来我可以跟女儿讲，我曾交往过钟敬文这样‘国宝级’的人物。而她将来只能从书本上知道，就像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鲁迅、胡适一样。”

——罗雪村



审美:魅力与缺憾

王朝闻,一九〇九年四月生于四川合江。一九二七年始，先后在私立成都艺专、岷江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任教。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宣部等单位工作。曾创作《鲁迅》、《民兵》、《刘胡兰》、《毛泽东选集》封面浮雕等一批影响广范的雕塑作品，出版有《新艺术创作论》、《论凤姐》、《审美谈》等二十多部理论著作,一九九八年辑为《王朝闻集》(二十二卷)出版,荣获一九九九年国家图书奖。主编有《中国美术史》(十四卷)、《美学概论》。历任

《美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去世。

一代美术宗师林风眠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艺术论丛》中指出，艺术不为人们所重视和艺术落后的原因就在于“艺术批评之缺乏”，缺乏欧洲那样有“用哲学生物学社会学为基础去批评艺术的批评家”。

此论或许有些偏颇，但道理自存。针对当前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中存在的相类似的问题，我们走访了林风眠的学生、美学家王朝闻先生。

采访先生之前，我们想起了那个是要遍地的金子还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的神仙的故事。聪明的读者一定想问：如何才能拥有一双像先生那样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王朝闻：感谢你对我的肯定。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我有相对的审美敏感呢？和庄子“庖丁解牛”的道理一样,要反复在实践中从事创造,熟能生巧。有时审美敏感就像一种本能似的，不让你关心，你偏要关心。你看桌上的这两件雕塑作品，一个是大足石窟童女，一个是麦积山石窟童女，都是供养人，形象都是在幼稚中见纯真的。但麦积山的这个比大足的那个越看越天真，似可认为,大足的略显成熟,麦积山的更觉朴实,两者有细微的差别。

这种审美敏感是不是和您从前搞过雕塑有直接的关系？

王朝闻：是有关系。实践为新知的重要条件。我一直强调审美主体有二重性，它可以是生产艺术的主体——创作者，也可以是观赏艺术的主体——欣赏者。如果一个人欣赏能力低，那么他的创作能力就无从提高与深化。

有论者认为，从生活出发，从艺术实践出发，使您的艺术评论能说到点子上，能抓住美的本质；而且在此基础上，您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体系。您引述过，王国维拈出“境界”二字为其理论的中心词，那么，您的理论的中心词是“审美关系”,还是“审美心态”?

王朝闻：是“审美关系”。“关系”的作用很微妙，它能够揭示矛盾、反映矛盾，为解决矛盾提供认识的依据。如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欣赏、感性与理性、分析与综合、一般性与特殊性等等的矛盾，都能在“审美关系”中反映出来。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句话：“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这和马克思强调的“有音乐感的耳朵”是一致的。我在五十年代提出“适应为了征服”、六十年代提出“喜闻乐见”，就是主张艺术要适应群众高尚的审美需要，体现群众健康的审美趣味。只有群众由衷地接受了你的作品，才会启迪对方的审美



◎王朝闻先生　　（罗雪村摄）

感受，并培养他认识生活、辨别美丑的能力。对群众来说，《三国演义》比历史著作《三国志》更有影响。

您上面的谈话和您的文章一样，贯穿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这个特点，甚至从您的文章题目中也可以看出来，像《矛盾的魅力》、《接近高潮》、《再论多样统一》、《一以当十》、《似是而非》等等。请问辩证法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朝闻：它使我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审美感受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特殊性是非常重要的。昆曲《林冲夜奔》，林冲唱词"一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就和同属逼上梁山的鲁智深的干脆劲不同，林冲的内心矛盾，符合他不彻底的反叛个性。同样是写对朝廷的不满，在不同的条件下，却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李白"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就和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情感大有差别；辛弃疾词句"回首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则表现对山河破碎的悲愤。审美有特殊性，所以我认为对敏感、幻觉、错觉、灵感等心态特征都应研究。李白的"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都是错觉。五十年代我在《欣赏，"再创造"》一文中引用杜甫《对雪》的两句诗："瓢弃樽无（酉录），炉存火似红"，这种有与无的强烈

对比,不是猎奇,是抓矛盾,它不只更能显示主人公那种由困窘状态所引起的烦恼心情，而且这种对比联想，说明主人公把自己的情绪当成反复体验的对象，是审美感受的深化。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特征，就会变成抽象空洞的一般化。理论文章虽要抽象思维，但它应以从个别见一般为宜。

所以您最鄙视那种惯用“栩栩如生”、“天衣无缝”等词的人云亦云的艺术评论。可是当前这种评论为数不少，还有一些是朋友之间互相吹捧的文字。

王朝闻：缺乏创见、人云亦云的艺术批评，不只表明自己的生活知识和艺术知识的贫乏，不只表明自己不敢坚持己见，不只表明自己可能习惯于见风使舵，而且，也表明自己对于特定的审美对象缺乏不与人苟同的独特的主观感受。更根本地说，缺乏区别于别人的审美个性。第一个用“栩栩如生”的人，人们觉得他用得贴切；三番五次地用这个词，就是脱离了新对象的具象性，说了等于没说，是一种不动人的空话。至于朋友之间的互相吹捧，是对读者不负责任，对朋友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它不真、不善，也不美，是与假恶相关的丑。与朋友交心，不能应付了事。

当年周扬同志问您美学论文为什么不美，

看来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王朝闻：周扬同志问得有道理。他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从概念到概念，似乎是概念游戏的理论文章。当时理论界有一种绝对化和武断性的文风。美学论文之所以不美，是因为论者缺乏真情实感，缺乏缜密的审美个性。

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过：“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您作为美学家，感触一定更多，那么您是幸福感多还是苦恼多？

王朝闻：一般地说，苦恼多一些。唉，现在有些画家、艺术家太懒了，题材撞车，赶时髦。有人把不成功的城市雕塑叫“城市垃圾”，“性感就是美感”的调调儿阴魂不散，糟糕！我反对以丑为美、实则不美的审美标准。当然，有苦恼，也有愉快。我的小孙女，大约四岁的时候，听说她出差的爸爸将要回家，就跑过来对我说“:爷爷,你的儿子快要回来了。’这虽是孩子的游戏活动，但它的魅力正如袁中郎论“趣”时所说：“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说到“趣”，您最大的兴趣应该是美术评论吧。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世纪回眸——新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经典作品展”，引起了较大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